

論 点 摘 編

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启示

乔茂林、刘旸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绝不仅是一个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在于,系统阐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科学评价方法,从而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哲学方法。这是一个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以“三个态度”“两个不因”“六个不能”和“两个不能否定”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总体战”,必须坚持立体多维的实践路径,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法治化进程,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层次与宣传水平,加强网上舆论工作,形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三维探赜

索世帅、孟宪平在《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从结构维度看,包括不同文明特色论、东西文明互鉴论、文明冲突超越论、文明进路多样论等内容;从叙事维度看,采用了贴近现实、根植历史、面向未来、体现辩证思维等方式;从特征维度看,呈现了追赶时代潮流的世界全景透视、体现主流价值的人类命运关怀、注重自身发展的自觉自信精神、兼济共赢发展的共建共享愿望等特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推进五四精神时代化的历史经验

张金福、石书臣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而且建党一百年来不断推进五

四精神时代化,激励着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五四精神时代化的主要历史经验在于,强调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是五四精神时代化的显著特征,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是五四精神时代化的核心内容,围绕中心任务赓续传承是五四精神时代化的主要路径,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是五四精神时代化的推进载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五四精神时代化的根本保证等。在新时代,必须进一步推进五四精神时代化,发挥好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内在逻辑

朱永刚在《学术探索》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新时代中国发展步入关键历史时期,面临来自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意识形态、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自觉,牢记“两个务必”的实践智慧,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论指导,推进自我革命的战略选择,发扬斗争精神的意志品质,展现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并发展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百年忧患进程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群众的支持中获得力量源泉,从世界大国兴衰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的实践哲学。

超越资本文明: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学理性根据

郝志昌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资本文明形态为现代文明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但其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和畸形发展。文明形态要想以合理的价值指向性向上跃迁,就必须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异化和畸形的“世界图景”。因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必须变革生产力,使人与自然关系达成全面和解;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使人与

人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必须变革人的存在方式,使自由个性得到本真展现。这构成了当今时代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重大事件,而反映时代性的主题,关注人类性的内容,是哲学的理论自觉,哲学理应对此做出原则上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引领和塑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意蕴及其重要意义

杨仁忠、张诗博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共同世界,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角色、地位、作用、诉求、价值观念、利益等差异。既互有差异又密切相连的基本结构把多元治理主体聚拢在一起,形成承认差异、寻求统一的公共性意涵。“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彰显的正是这种公共性。鲜明的基层向度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性的结构性要素,促进着基层治理主体公共精神的发育;平等参与、充分表达和民主协商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基层民主,保障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认同在生成公共价值标准的同时,还包含着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和情感认同;民生福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性的利益基石,它遵循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路径,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性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

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的共振

耿亚东在《治理现代化》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开放、共享与前瞻构成了大数据的基本发展理念。服务型政府作为与时俱进的政府,是以资源开放为前提,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开放性政府。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共享性的政府,它会主动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引导其他治理主体合理地分享信息资源及其他资源。它的灵活性决定了它会前瞻性地处理前景无法准确预测的事件,创造性地发现各种潜在问题并予以灵活解决。这意味着服务型政府倡导的开放性、共享性、前瞻性理念与大数据的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未来,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念将会与大数据的开放性、

共享性、前瞻性的理念越来越融合,服务型政府不仅可以有效地驾驭大数据,并灵活地应对大数据的挑战与冲击,服务型政府还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机遇和价值,为更加有效地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提供指导和依据。

优化智库外部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

柏必成在《学习论坛》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智库的外部制度环境对智库的建设、发展和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由外生于智库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构成,这些制度安排有三种类型:政策过程开放性与透明性的制度安排、智库决策咨询活动开展的制度安排、决策主体和咨询主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应,不断优化智库的制度环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可以从三个维度着手:围绕政策过程的开放性与透明性加强制度建设,具体包括政策信息发布与披露制度的建设、政策意见征集制度的建设、政策意见回应与反馈制度的建设;围绕智库开展决策咨询活动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加强制度建设,具体包括决策咨询活动实质性与程序性制度的建设、决策咨询活动激励与保障制度的建设、决策咨询活动监督与约束制度的建设;围绕决策主体和咨询主体关系的合理性与适宜性加强制度建设,具体包括从制度上促进决策主体对智库作用的高度重视、对智库“库格”的尊重与维护以及对智库研究成果的理解与应用。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

魏成龙、罗天正在《经济经纬》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互联网影响科技创新的非线性传导机制的结果表明:互联网能够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互联网基建水平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互联网的使用水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科技创新产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科技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基础建设水平对科技创新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均呈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科技创新促进作用较小,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大。基于此,第一,应从多层次、多方面对互联网

发展进行投入。政府应充分利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加速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鼓励云使用,真正将“互联网+”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关注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强大助力。面对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应发挥互联网跨区域的优势,鼓励以“互联网+”金融、数字经济等金融发展的新模式,以降低各省份间金融发展的差距,更好地助力科技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张合林、王颜颜在《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基于此,第一,应加快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一是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进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引导农民正确使用普惠金融电子产品。第二,要积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区域间的融通性与渗透性,提高各地区的空间相关度。此外,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础的差异性应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第三,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融入农业发展。一方面,丰富农业数字化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在准确把握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前提下,对农业扶持应有重点有规划。

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利益关联的视角

孙云龙在《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农民利益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农民利益的保障程度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程度。乡村、社会和国家三者利益关联机制的构建方式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利益关联机制由利益增量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利益调控机制构成。这三种机制的不同运行路径体现了不同的方针政策,不同的方针政策只有针对相应类型的乡村社会才能行之有效。贫瘠型村庄应当更加注重利益增量,战略型村庄应当侧重于利益补偿,发展型村庄应当将重点放在利益调控上。

只有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成不同类型的利益关联机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才不致发生偏差。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陈东辉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8日撰文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关键要解决好五个方面问题。一是优化生育政策。立足于我国人口现状和未来人口发展态势,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强化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引导已婚家庭在女性最佳生育期生育孩子,降低高龄产妇分娩率和整体出生缺陷发生率,确保出生质量。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减少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二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培训,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鼓励专业技术领域人才适当延长工作年限。引导老年人再就业和参与社会活动,支持身体健康、有技术专长的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实现自我价值。三是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把握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发展银发经济,丰富养老服务业态,推动医养结合、康养结合、护养结合,支持养老服务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增加老年用品供给,提升老年用品科技含量,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四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具有针对性的老龄化服务体系,改善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支撑条件,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高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需求。五是加强老龄社会制度建设。根据人口老龄化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慈善制度、老年人监护制度、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制度,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徐学庆在《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质是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实现城乡文化的均衡发展 and 融合发展。新时代我国城乡文化发展依然失衡,农村是我国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要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针,着力补齐农村文化发展短板。为此,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二要提高认识,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思想基础;三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四要拓宽投入渠道,建立农村文化多元投入机制;五要强化文化人才宏观调控,促进优秀文化人才流向农村。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难题及其应对

李三辉在《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影响着乡村发展的内在价值走向。当前乡村文化建设正迎来从式微到振兴的最好时代机遇,然而,推进我国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现代化建设水平偏低、优秀文脉接续危机、法治文化建设欠缺、文化人才力量不足等困境。考量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方式,其基本思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指引、持续推进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保护传承乡村优秀文化、践行乡风文明建设新行动、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培育乡村“三治”文化、深化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的三重逻辑

姚广利在《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主题的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对加强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政课的逻辑主要体现为情感逻辑、理性逻辑、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在情感逻辑方面,红色文化资源主要以鲜活材料赋能思政课;在理性逻辑方面,红色文化资源主要以真理实践赋能思政课;在价值逻辑方面,红色文化资源主要以理想信念赋能思政课。红色文化资源赋能思政课的逻辑展示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耳入脑入心的作用机理。

“沿黄”黄金旅游带构建与可持续发展

程遂营在《中国文化报》2021年1月16日撰文指出,大黄河之旅正日益成为广大游客认知、了解中国的窗口和文化名片。沿黄黄金旅游带的建设,应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合作,以点带线,以线连面,逐渐扩大区域,实现合作共赢。沿黄中下游黄金旅游带的构建,建设以延安、太原、大同等城市为主要依托的,以晋商文化、革命圣地文化、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晋陕黄河旅游区(圈),以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省为重点,构建以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古都为主要依托的陇海黄河文明旅游隆起带,构建以济南、曲阜、泰安、东营等城市为主要依托的,以“圣山圣水圣人”为主题的山东沿黄黄金旅游带,建设河南隋唐大运河精品旅游走廊。对沿黄黄金旅游带的开发,应本着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明确保护黄河流域脆弱生态的基础上,找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合理路径,从而保障黄河文明发展的世代永续。

生存的美学维度与文学记忆的功能阐释

沙家强在《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基于创作主体作家的文学记忆研究,重在关注作家的“记忆”精神现象对文学生成的意义,即作家选取什么样的记忆便会深刻影响文学本身的轻重与深浅。人是记忆存在物,记忆与人之生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基于生存的多维性、苦难性和符号性等人之生存的一般性特征,美学意义上的生存特征应是生存的多维向度、生存苦难的美学升华及生存符号的诗意栖居。基于生存的美学纬度,文学记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身份的认同、伤痛的疗救、批判的启蒙和记忆的唤醒等方面。立足当下消费时代或后现代现实语境,秉持文学记忆的功能价值,我们对“什么样的‘记忆’值得去记忆”这个问题,有一个美学上的合理判断,进而能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文学发展的走向,避免文学失衡或趋向危机的态势出现。